

东干人的

著者：A. A. 张
译者：丁宏

习俗、礼仪与信仰

ОБЫЧАИ, ОБРЯДЫ И ПОВЕРЬЯ ДУНГАН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跨境民族与边疆社会稳定研究团队」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
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跨境民族与边疆社会稳定研究团队”成果

东干人的习俗、礼仪与信仰

ОБЫЧАИ, ОБРЯДЫ И ПОВЕРЬЯ ДУНГАН

著者：[吉尔吉斯斯坦] A.A. 张

译者：丁 宏

Бишкек ~ Илим~ 2016

比什凯克—伊力木—2016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干人的习俗、礼仪与信仰 / (吉尔吉斯斯坦) A. A. 张著;
丁宏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660-1337-8

I. ①中… II. ①A… ②丁… III. ①东干人—民族—文化—研究
②东干人—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研究 IV. ①K512.8 ②B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1870 号

东干人的习俗、礼仪与信仰

著 者 [吉尔吉斯斯坦] A. A. 张

译 者 丁 宏

责任编辑 吴 云

责任校对 赵 静

装帧设计 舒刚卫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3757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337-8

定 价 58.00 元



“边宗教发展趋势及其社会作用”国际学术研 Conference for “The Religion Development Trend of Countries & Its Social Effect”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CASS)
Sponsor: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协办：宗教文化交流中心、深圳宗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Co-organizer: Center fo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xchange, Shenzhe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Hong Ko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 著者 A.A. 张与译者丁宏

“东干人”特指自 19 世纪 70 年代始从中国西北地区迁至中亚的回民及其后裔。本书向读者全面介绍了该群体的社会生活，包括“回”称谓来源的几种观点、东干伊斯兰信仰的特点、亲属称谓、家庭关系、饮食习俗、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发展等各个方面。阅读此书，可以全面了解东干文化以及东干人的生活方式。本书对于民族学研究者、教师及大学生尤为适用。

责编：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M.X. 伊玛佐夫教授

审稿：Дж. 朱努沙力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历史学博士）、А. 主麻纳里耶夫（历史学博士）、А.З. 贾巴罗夫（历史学副博士）

本书由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推荐出版，郑和文化交流国际基金会对本书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俄文版、吉尔吉斯文版、东干文版及中文版提供支持。

书中所有图片由 А.А. 张提供。

序言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其中发生在西北地区的起义被学者称为“东干（回民）起义”并以此著称于世。这场起义始于1862年，波及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以及长城之外的新疆伊犁地区。起义者以农民为主，其矛头指向满清王朝。应该承认，伊斯兰教信仰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思想根源，宗教领袖和清真寺是起义的组织核心。自发性、缺乏统一领导、武器装备差、没有军事经验、军队组织具有地域性及同乡性等特点，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导致他们在清军的镇压下被迫撤退。根据目前的资料数据估计，这次血腥事件造成大量人口损失。到1877年，东干（回民）起义者经过15年的浴血奋战，为了避免被灭绝的命运，他们被迫远离历史故国到现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寻找生路，接受了当时俄罗斯帝国的国籍。

西迁中亚的第一路人马来自宁夏——当时宁夏属于甘肃，其领袖是尤素甫－哈孜列特（Юсуп-хазрет），东干人称为“阿爷老人家”（Ае Ложынжя）。这路人马于1877年11月初翻越别捷里（Бедель）、伊什迪克（Иштык）山口来到了今天的卡拉科尔（Каракол），当时该地被称为普尔热瓦尔斯克（Пржевальск）。1878年春天，这批东干人在

分给他们的、距普尔热瓦尔斯克以西 6—7 公里的美丽土地上建立了伊尔德克(Ирдык)村。

第二路人马是穆罕默德·阿尤布·白彦虎(Мухаммед Аньюпом Бай Яньху)率领的陕西籍起义军。他们经恰克马克(Чакмак)峡谷,翻过托鲁嘎尔特(Торугарт)、塔什拉巴特(Ташрабат)山口,于 1877 年 12 月 6 日到达俄罗斯军事帝国要塞纳伦(Нарын)。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得到允许前往托克马克,并在当地挖出的窑洞里过冬。1878 年春天,他们在楚河右岸哈萨克人的地方建起卡拉库努孜(Каракуруз)东干人聚居区,当时这里属于比什别克(Пишпек,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译者注)县。“卡拉库努孜”是当地人的称谓,而东干人自己称之为安营扎寨的“营盘”。如今,这个村的名称是“马三奇”,是为纪念苏联国内战争英雄、著名社会活动家、东干人马三奇而命名的。他于 1937 年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被枪决了。如今马三奇村属于哈萨克斯坦。第二路人马的一部分留在了托克马克市及其郊区,如伊斯科拉(Искра)、坎布伦(Кенбулун)等。

第三路人马由马大人(Ма Дажын)率领,于 1877 年 12 月 19 日到达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奥什地区,并在苏来曼山附近的筛赫(Шейх)街区过冬。1878 年,在阿莱—谷琴(Алай-Гульчин)谷地,当地政府分给这批东干人土地,但他们以不适宜农耕为由而拒绝了。这样,他们流落在费尔干纳盆地,以给有钱人打工维持生计。只有到了苏联时期,1924 年他们分得了土地,才建起了萨瓦依(Савай)村。这个村后来的名称是克孜尔·沙尔克(Кызыл Шарк)。

这批人中有一部分人为了能够与主要生活在楚河流域的同胞近一些,便继续迁移,1883 年,他们到了阿乌利耶—阿塔(Аулие-Ата,

今塔拉斯)附近的贾尔巴克·秋别(Джалпак Тюбе),建立了村庄,当地人也将这个地方称为“东干诺夫卡”(Дунгановка),即东干人的地方。

历史学家将以上东干人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过程视为移民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发生在1881—1883年间,是与沙俄把伊犁地区归还给中国联系在一起。按照1881年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中俄伊犁条约》——译者注)的规定,伊犁地区的东干(回民)、维吾尔居民可以选择国籍归属中国或者俄罗斯帝国。由于担心因他们参加回民起义的行为而遭受来自清政府的迫害,许多东干人(回民)选择了归属俄罗斯帝国。1882年春天,来自伊犁的东干人在威尔内(Верный,今阿拉木图)附近建立了村庄(今天的佐俩·瓦斯道克 Заря Востока——“东方曙光”村),在比什别克建立了东干人的街区“东干诺夫卡”(Дунгановка),并建立了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东干村。根据档案资料,1881年在比什别克有13户东干人家,到1882—1883年间,已达到290户。一部分东干人因迁徙资金不足而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定居到了扎尔肯特(Джаркент)城及附近村庄。

由此,东干人成了中亚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族人民共命运,并为国家经济、科学及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突厥斯坦地区唯一曾在沙俄军队中服过兵役的民族,几乎参加了沙俄帝国所有的战争。伊塞克—库里(Иссык-куль)伊尔德克村的东干人和扎尔肯特城的东干人参加了1916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译者注),他们站在吉尔吉斯人一边,其中一部分伊尔德克村和卡拉科尔村的东干人惨遭镇压,一部分人被迫跑到

中国。其结果是村子几乎空了，被哥萨克人所占领。直到 20 世纪，幸存者才返回被摧毁的家园。

在俄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及集体化的年代，东干人和其他群体一样对上述运动表示赞成或者反对，其结果是一部分东干人与其他民族一样跑到了国外，斯大林时期也有东干人遭到了镇压。到“二战”前，许多东干村因为农业的高产而闻名，特别是伊尔德克、米粮川（Милянфан）东干村的劳动者很有名。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出色的劳动表现，米粮川的王麻子（Вонмаза Ч）、冯老二（Фунлоэр С）及吴董拉尔（Вудунлар Н）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一批获得列宁勋章荣誉的人。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只有 1.4 万人的东干人中，就有 5000 人响应号召上了前线，大约有 2000 人壮烈牺牲。许多前线战士被授予战斗勋章、奖章，其中王阿訇（М. Ванахуну）牺牲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如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边境关卡仍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后方，有数千名东干劳动者以顽强的工作精神迎接战争的胜利。

战后，东干人与吉尔吉斯斯坦其他民族一道，为国家的繁荣而耕耘。他们战斗在各行各业。例如：两次获得苏联劳动勋章的塔什洛夫（Х. Таширов），他所领导的村庄有 9 人因为突出的劳动业绩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苏联人民演员穆赫塔洛夫（Х. Мухтаров）的名字不只为吉尔吉斯人民所熟知；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十娃子（Я. Шиваза）的诗被译成吉尔吉斯文、俄文、汉文及其他文字；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别别佐夫（Х. Бебезов）和冯老二（И. Фунлоэр）挽救了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且别别

佐夫的事业在他的儿子巴哈德尔·别别佐夫（Бахадыр Бебезов）那里得到延续，后者的贡献丝毫不比他的父亲逊色。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有知名人物，如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尚洛（М.Я. Сушанло），语言学博士、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伊玛佐夫（Имазов М.Х.），语言学博士十四儿（Шисыр И.С），等等。此外，还有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功勋法律学家纳西子（С.Х. Насиза），他拥有“国家三级司法顾问”这一高级职衔。

如今的东干人，他们认同自己的居住国，认为自己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公民。

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其他国家的东干人，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地兄弟民族的文化因素。这种影响几乎涉及所有方面，既包括物质文化方面，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同时，东干文化也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特别明显的是在饮食和农业方面。目前，当地人已经接受了这些东干食品，如包子、拉面、面片儿、凉粉、火烧等，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民族传统。当然，毫不怀疑，他们把这归功于东干人。这样的事实不仅被民族学的研究所确认，而且也被菜名的语言学分析所证实。直到今天，当地的一些菜名仍然使用东干语，在市场上买菜的人还是用这样的称谓，如“笋子”（сунза）、“芹菜”（чинсай）、“豇豆”（джёнду）、“韭菜”（джусай），等等。同样，在东干人的任何一个庆祝活动中，也不能缺少当地其他一些民族的食品，如油果子、肉末面条、抓饭、熏马肠、发酵小麦饮料及酸奶饮料等；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东干家庭都会用花毡（ширдак）或者绣花毡（ала кийиз）装饰居室。而东干、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的服

装，如今也已几乎看不出差别。各民族的交融带来了文化的丰富、社会成员的团结及各民族的和平共处。正是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各个民族不同的生计方式，为吉尔吉斯民族（广义上的）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公民的认同感与共同性，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

中文版序言

A. A. 张

19世纪末，在1877年和1882年中亚广袤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回族移民。当地人，之后是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人。该称谓最初不仅仅是指这些移居中亚者，也包括中国的回族。新来的移民群体在文化与语言类型上与当地突厥人、俄罗斯人都有很大差异。当地突厥人大多从事畜牧业，属于游牧的生活方式；欧洲的移民，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虽然从事农业，但并不擅长从事灌溉农业。而东干人有别于当地人的，恰恰是他们在灌溉农业、园艺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这给予他们很大的经济优势。当然，东干人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农业技能上，即物质文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及风俗、礼仪等方面。东干人与当地居民在人类学类型上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上，即信仰伊斯兰教。这使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的土地，并接受了当地人的一些文化因素。与此同时，以相对聚居形式生活的东干人仍然努力保持着他们从历史故国——中国所带来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及仪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当地其他民族的文化。东干人的习俗、礼仪和信仰尽管

以伊斯兰教为主，但是也融入儒、道及中国其他各种文化元素。这些元素使得东干文化区别于吉尔吉斯、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等民族的文化特征，并促其民族认同的保持以及与历史故国的心理联系。然而，不能因此说东干文化是凝固不变的，伴随政治、社会制度的变化，苏联的解体，宗教影响的降低或者上升，在周围其他民族的影响下，东干人的民族文化及认同都发生了变化。上述因素还促进了包括东干的文化、习俗与礼仪，也包括其在中亚社会地位的文化转变。对东干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全球化，它带来了世界各民族差异的弱化，增强了人类生活方式、文化的同一性。在过去的十年中，东干人面临的任务是要掌握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的语言。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多数东干人通常除了掌握母语外，多精通俄语，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都将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构建统一国家认同的基础。上面所谈到的内容，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亚东干文化以及中国回族文化的兴趣。东干人仍然自称回族，也就是回族的一部分，这个民族的主体在中国生活、发展。应该说，作为中亚各国的公民，东干人成为促进中亚各国与中国之间民间外交的桥梁。这个事实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并得到中亚、俄罗斯国家首脑响应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回族的族源与东干伊斯兰教的特点、家庭关系、亲属称谓等，以及在仪式上保留着吉祥象征意义的中亚东干人的婚姻礼俗、妇女在家庭中的现实地位、养育习俗、割礼等。中国的读者能够看到（中亚东干人与中国回族）在节庆、丧葬及居住礼仪等方面的异同。当然，还要考虑与饮食相关的习俗，因为令民族学家感兴趣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

(回族)饮食文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同时，也不要忽略作为中亚东干人重要符号的命名习俗的变化。著者在全书结尾处，尝试着总结了有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几个观点。

笔者发现，书中所展示的信息并不全面，其中每一部分如果仔细研究，都足以撰写一篇博士论文并答辩。著者非常感谢未来的读者能够对中亚东干人(回族)群体的文化感兴趣。其中，特别要感谢丁宏教授为翻译本书所付出的劳动及耐力。如果没有丁宏教授的参与，没有她多年来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东干学与汉学中心的友谊，本书则难以付梓。同时，还要表达对中国的感谢——这个被东干人视为历史故国并对之充满温暖之情的国家，给予了东干人最美好的情感。

译序

丁宏

2015年7—8月，为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期间，应邀参加了“吉尔吉斯斯坦郑和国际文化基金会”的座谈活动，与会者多是熟悉的东干人。在这次活动中，我接受了一项特别委托，将东干人著名民族学家张·阿里·阿里耶维奇（Джон Али Алиевич）的著作《东干人的习俗、礼仪与信仰》译成汉文，并由基金会集资出版俄文、东干文、吉尔吉斯文及汉文四种语言文本。

我郑重承诺完成任务。虽然我的俄语没有那样好，而且从来没有独立翻译过一本学术专著，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其中，包含了对东干人那份凝固在心的深厚情意。

1996年11月，为撰写博士论文，我第一次踏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进行实地调研，此后，就把这里作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学术“田野”。当时，苏联解体不久，在中亚这块刚刚经历了动荡及社会转型的土地上，我作为一个异乡人，受到了东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哈萨克斯坦，我几乎在所有东干人聚居的村

庄、街道都生活过至少一个星期。当时任《回民报》主编的尤苏波夫定期开车拉着我，趁着到各东干人聚居区送报纸或者参加活动的机会，把我送到调研的村子，并按东干协会的安排，让我住在当地东干人家中。就这样，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这一家到另一家，我在中亚生活了近9个月，努力熟悉着东干人的一切——他们的历史、语言、习俗与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东干文化研究》。

1998—1999年，我再次作为访问学者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学习、生活了一年。期间，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课程。此后，我又以开会或者学术合作、交流名义多次赴中亚。每一次，我都有回故乡的冲动……从1996年至今，20年过去了，当年一些给予我极大帮助的东干师长、朋友甚至已经故去，如著名学者М.Я. 苏尚洛、И.И. 尤苏波夫，诗人、东干语播音员阿依莎……特别是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东干语言学家伊玛佐夫先生的妻子玛丽娅姆，她曾经给我那么多的关怀和照顾。我与伊玛佐夫先生合作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俄文版的《中国回族》（比什凯克，1999），一本是汉文版的《亚瑟儿·十娃子的生活与创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两次的写作均在夏天，都是在伊玛佐夫先生家中完成的。在东干人家的庭院中，往往会沿一面墙搭建一个“大炕”，上面有顶棚，其他三面则是开放的。东干人家来了客人，往往请客人坐在炕上，主宾围桌而坐，喝茶、聊天、吃饭。我们的写作就是在“炕”上完成的。伊玛佐夫家的院子宽敞、干净，院子里种着西红柿、辣椒、黄瓜、韭菜、茄子，还有葡萄、苹果，玛丽娅姆每天都摘一些新鲜水果、蔬菜摆在我们写作的桌子上，让我们休息时品尝。她做的各种饭

菜，特别是韭菜包子，让我这个东北人在国外还能够感受到最地道、最熟悉的家乡味道……与伊玛佐夫先生的两次合作，是我至今在一段时间里做事效率最高的经历，而其中尤其要感谢的，就是玛丽娅姆。

由于共同生活、工作过，我自认为对东干人是了解的，包括他们的文化、性情、民俗，以及对于社会、人情的看法。我甚至认为自己是合适的译者。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让我满满的自信一度跌至谷底。翻译中的难点不仅仅包括语言能力问题，也包括相关背景知识方面的底气不足。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我提供无私帮助的每一位朋友、同仁。特别是本书的作者，对于我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能够及时回复、解释，这是我能够最终完成翻译工作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学术界，“东干人”特指自19世纪70年代始从中国西北地区迁至中亚的回民及其后裔，这个群体在苏联所进行的民族识别中被赋予“东干”的族称。在苏联及现在独联体的东方学研究资料中，“东干”一词既包括中亚东干人，也包括中国回族。这是沿袭了早期俄罗斯文献的传统称谓。在东干学者的著作中，也用“东干”一词，但东干人并不称自己是“东干”，而是自称“回回”“老回”“中原人”“回族”“回民”。也就是说，作为族称，“东干”并不是东干人对自己民族的称谓，而是他称。这一点，在本译著中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据2009年两国人口统计数字，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口数量是58409人，哈萨克斯坦是51944人。此外，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口为3000—3500人。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亦有少量东干人分布。中亚东干人群体以其文化的独特魅力而颇受学界关注。特别是在语言、文字方面，东干人被视